



上海出版基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李君如著作集

15

中国共产党执政史概要

协商民主 解读中国民主制度



上海出版资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

李君如著作集

15

中国共产党执政史概要

协商民主 解读中国民主制度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著作集出版得到
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峰学科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设资助

目 录

中国共产党执政史概要

绪论	3
一、革命与执政的变奏	14
(一) 1949—1956:执政背景	14
(二) 社会变革中的执政实践	18
(三) 社会变革中的执政党的建设	53
(四) 小结:革命与执政交错中的历史经验	76
二、探索的辉煌和挫折	83
(一) 1956—1966:执政背景	83
(二)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执政探索和挫折	94
(三) 在曲折中发展的执政党的建设	119
(四) 小结:在执政与革命的悖论中	133
三、执政条件下“继续革命”	137
(一) 1966—1976:执政背景	137
(二)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执政实践	146
(三) “文化大革命”中的执政党的建设及其困难境地	170
(四) 小结:十年伤痛、十年教训	176

四、执政主题的转变	182
(一) 1976—1989:执政背景	182
(二) 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的执政实践	194
(三) 自觉执政起步时期的执政党的建设	209
(四) 小结:建设与改革同步	225
五、执政理论的创新	232
(一) 1989—2002:执政背景	232
(二)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 21 世纪的执政实践	244
(三) 执政党的建设从经验到理论的发展	281
(四) 小结:“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的相互促进	301
六、执政经验的升华	309
(一) 2002—2010:执政背景	309
(二) 执政实践的深化与执政经验的升华	318
(三) 党的十六大以来执政党建设的创新	335
(四) 小结:历史新起点上执政的新经验	343
七、结论	352
后记	370

协商民主 解读中国民主制度

序言	377
民主的反思	377
中国有民主吗?	379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民主的“特色”之所在	382

由来: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	391
从“我们是协商民主的受益者”讲起	393
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与统一战线法宝	395
协商民主是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397
协商民主在统一战线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转型中走向制度化	400
制度创新: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	405
从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到人民政协的召开	407
人民政协建立过程中协商民主思想的形成	413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的形成	418
理论创新:人民政协的转型和协商民主的理论提炼	425
人民政协性质和任务的两次转型	427
人民政协的特点	432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发展	435
改革蓝图:中共十八大对完善和发展协商民主的构想	439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441
过去 30 多年改革中所取得的进展及其需要澄清的问题	445
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十八大报告的一大亮点	449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发展协商民主的构想	455
新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形式: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协商民主	463
政党之间的协商民主	465
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	471
国家政权机关的立法和决策中的协商民主	479
基层的协商民主	488

结论·····	496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思考·····	496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关系·····	508
附录·····	511
后记·····	519

中国共产党

执政史概要

绪 论

中国共产党自 1949 年掌握全国政权以来,已经走过了 60 多年的历程。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对于 21 世纪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是一项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开创性工作。

一、党史、国史和执政史

在进行这一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 60 年的研究,给予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首先,中国共产党执政 60 年的研究,属于史的研究,是历史科学研究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执政 60 年的研究,又承担着总结历史经验的重任,在这个意义上,这项研究也可以说是论的研究。或者说,它具有论的研究的特点和任务。但是,从其总体要求和基本特点而言,这项研究还是应该属于史的研究。

其次,中国共产党执政 60 年的研究,具有党史研究和国史研究的双重特点。或者说,这一研究是介于党史与国史之间的一项研究课题。之所以说它具有党史研究的特点,是因为这项研究工作,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 1949 年以来的历史;之所以说它具有国史研究的特点,

是因为这项研究工作，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国家政权自 1949 年以来建立、巩固和完善的历史，以及这 60 年中间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重大历史事件。

再次，中国共产党执政 60 年的研究，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的研究。这一项研究工作的特殊性在于，它既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背景，又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包括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和完善国家政权的历史实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还要研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积累的历史经验。因此，本书以 1949 年至 1956 年、1956 年至 1966 年、1966 年至 1976 年、1976 年至 1989 年、1989 年至 2002 年、2002 年至 2009 年这六个阶段构成的 60 年历史为“经”，以执政背景、执政实践、执政党建设、执政经验总结这四个方面的研究为“纬”，展开中国共产党执政 60 年历史的研究。

应该讲，作为一门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本书的研究工作是初步的、浅层次的。因为，执政实践研究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尽管我们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还是十分肤浅的。我们相信，随着我们研究的逐步深入，会有这方面成果面世。

二、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

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 60 年，属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研究，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就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执政史。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历史过程。

局部执政,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执政。众所周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条在当年被称为“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具有三个要素:一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二是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三是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1927年11月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5月建立了湘赣边界统一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928年1月,还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了《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这对于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提供了规范性的文件,推动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在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特别是在开辟中央苏区的过程中,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与国民党政府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现在我们的人民政权及其各大主要部委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制币厂等,都可以追溯到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出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共产党瑞金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两个政权都宣布自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但两个政权的行政管辖能力都到达不了对方控制的区域。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已经是执政党了。以后,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延安特区政权机构,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和掌握的政权。我们把这种政治现象,称为

“局部执政”。

毛泽东曾经从哲学上论证过这种政治现象，称它是事物在量变到质变过程中发生的“部分质变”。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就是从部分质变到质变的过程。质变就是我们所说的“全面执政”，即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

由于过去我们研究党史，主要研究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所谓党内路线斗争史代替党史，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而对于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史研究不够，其原因即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问题上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发展过程。

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党。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应该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历史，研究局部执政与全面执政的区别和联系，研究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一以贯之的执政规律。

这里，我们研究和展示的，仅仅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 60 年来的历史及其经验，而非中国共产党全部的执政历史和经验。这是必须提出并加以说明的。

三、从自在执政到自觉执政

当我们把研究中国共产党 60 年执政史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人们会问：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全面执政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现在才重视这项课题的研究？这与认识来源于实践，历史研究总是在历史实践之后有关，与我们党对执政实践、执政经验、执政规律的认

识有一个过程有关。

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 60 年的实践,可以说是波澜壮阔,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和曲折的认识过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经历了一个从自在执政到自觉执政的历史过程。

这里说的“自在执政”,指的是客观上存在着执政的事实和执政的实践,但是执政者对于执政的环境和政权的认识,对于执政的方式和特点的认识,尚缺乏深刻的正确的理念。好比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初期,他们与资本家激烈对抗,破坏机器和工厂设备,但是不懂得自己的阶级利益之所在,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形成代表本阶级利益的组织或政党。这时的无产阶级还只是自在的阶级。同样的道理,一个政党在斗争中赢得了政权,并且开始了执政的实践,但是尚未完全懂得政权赖以建立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尚未完全懂得政权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又是一种公共权力,尚未完全懂得公共权力所面对的大众与执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基础及其利益诉求之间的复杂关系,尚未完全形成符合执政规律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机制,这时的执政实践还只是一种自在执政的过程。

但是,认识来源于实践,自在执政的实践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势必促使人们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势必形成不断完善的执政理念。好比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形成正确的纲领和指导思想,开始为整个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时候,自在阶级就转变为自为阶级一样,一旦执政党根据科学的执政理念来完善执政方式、转变执政机制,自在执政就进入了自觉执政的阶段。

当然,这种分析仅仅是理论的抽象,现实的执政实践要比这种抽象复杂得多。有时候,在总体自觉执政的阶段却仍在一些方面处在自在

执政的情况,而在自在执政阶段依然有一些自觉执政的要素和特点。还需要说明的是,从自在执政到自觉执政只是执政实践和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而不能简单地视作错误与正确的两个阶段。对此,我们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执政实践的全过程及其演进的各个阶段,进行具体的符合实际的科学分析。

就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 60 年历史而言,情况更为复杂。这 60 年,以政权的社会属性来划分,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49 年到 1956 年。当时,中国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的政权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反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政权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由于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早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因此在党执政后,能够自觉地按照社会的客观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来治理国家,既根据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在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后,进一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又以生产为中心,在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后,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可以说,这样的执政是自觉的执政。第二阶段,是从 1956 年以后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执政,政权的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对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问题有比较多的论述,而对于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尚处在探索过程之中,还缺乏成熟的经验;特别是由于我们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么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基本问题,也经历了一个

长期而又曲折的认识过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个从自在执政到自觉执政的认识转变过程。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执政的历史,可以以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把这之前的执政实践与这之后的执政实践,视作从自在执政到自觉执政的两大阶段。因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和国家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同时也真正认识到了国家政权是造福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力;从那时开始,我们明确提出并坚持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的原则,进而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从而使国家政权真正成为维护全体公民合法权益的公共权力;从那时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过程中,明确地按照“执政党”的要求和目标来加强自身建设,直至提出完善执政党建设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增强了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过程中,更加自觉地按客观规律来执政。

至于改革开放前,在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不存在的情况下,依然把阶级矛盾看作是国家政权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甚至提出一切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党外到党内寻找和设置阶级斗争的对象,直至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踢开党委闹“革命”,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违反宪法和法律,自己摧毁自己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等国家机构,严重侵犯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造成了一系列严重违反民主法制精神的悲惨后果。但同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在党的八大前后,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错误的时候,在国民

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党的许多认识和决策是正确的。这两方面的情况说明，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对执政规律有一定的认识，但还不够坚定，还不能在任何场合下都坚持合乎执政规律的自觉执政。所以，评价改革开放前的执政实践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有正确，也有失误，总体而言，是我们的认识尚未完全达到自觉执政的境界。

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正由于我们有了这么多年自在执政及其积累的丰富经验，才使我们能够在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之后，经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自觉执政的新阶段。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这60年，我们党在执政实践中取得的一个辉煌成就，就是我们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执政理论，并且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进一步增强了党的执政基础，逐步完善了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机制，在努力探索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向自觉执政转变。

如果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这种转变，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种转变是一个艰巨的政治变革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

之所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进入自觉执政新阶段的标志，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那时开始，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之业和思想遗产，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